

吕留良藏刻书考

游 帅 周静婷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部 北京 100083)

摘 要 本文从文化背景、藏书情况和刻书倾向等几个角度,对清代文字狱案的重要牵涉者——吕留良其人的藏刻书情况展开考察,认为吕氏著述倾向与藏、刻书活动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

关键词 吕留良 著述 藏书 刻书

DOI:10.13514/j.cnki.cn14-1186/k.2016.04.010

吕留良,浙江崇德(今桐乡市崇福镇)人,字庄生,号东庄,又名光轮,字用晦,号晚村,别号耻斋老人、何求老人、东海夫子、吕医山人、南阳白衣人等,出生于崇祯二年己巳(1629)年,卒于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八月十三日,是清初浙江著名学者,在有清一代学术史、政治史上皆颇具影响。其生活在明末清初的特殊时代,在清初历史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澜。由于文字狱之故,其声名渐没,以致后人对吕氏各方面的研究未能有效展开,与其历史地位而言殊不相称。目前学界对吕留良有限的关注点主要还是集中在其著述、思想等问题领域,而在吕氏藏书、刻书方面几无涉及。事实上,围绕吕留良藏、刻书活动进行考察,对于我们推进吕留良研究的继续深入,提供吕留良研究的新视角,对其建立更为全面的认知,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一、吕氏藏书与刻书情况概述

1. 文化背景。清代私人藏书风气极盛,藏书事业颇为发达,刻书活动亦相当活跃,尤以江浙地区为显。“有清一代藏书几为江浙独占”^{[1](P37)},而由于经济繁荣提供的杠杆作用,这一地区的刻书业同样也非常发达。藏书方面,江南的藏书事业自古就有良好的传统,许多文人学士为治学著书,积累了大量文献,同时为丰富自己的藏书,往往雪钞露纂,晨夕经营,梯行访求,互通有无。吕留良上承祖荫,家业丰饶,自其叔祖吕炯起,吕氏一族已在文坛享有一定声望,且藏书活动也已有相当规模。冯梦祯在为吕炯所作《吕先生行状》中就详言道:“先生多购书,自经史百家及二氏之书,无所不精究。所为诗文,多雄丽超逸,晚而归于大雅。善书家八法,具体赵吴兴。又好蓄古丹青、法书、金石、奇器,聊以适情,不至耽溺。所著述有《道德经解》《山林漫言》《艺苑目录》《友芳园杂咏》《素心居集》藏于家。”^{[2](P38)}由此看来,吕留良一生所从事包括藏书、诗文书法、刻印制

作者简介 游帅(1990—)男,山东菏泽人,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训诂与历史词汇。

周静婷(1983—)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北京语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

[1]袁同礼.清代私家藏书概略.图书馆学季刊,(第1卷第1期).

[2]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3.

砚在内的多种活动,所受其叔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而藏书家友朋之间的互相交往,也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吕留良的藏书。吕留良与黄宗羲、张履祥等友人间关于藏书的交流互借就甚为频繁,并多见于其与友人的往来信札当中。如康熙六年,吕留良《与黄太冲书》即载“外明人选本及宋元明文集,《易象》廿本,《詹氏小辨》一本,《攻愧集》三本,又《韩信同集》《金华先民传》,俱望简发。”^{[1](P157)}同年在与张履祥的书札中也曾向对方表达了借钞其所言善本的愿望。“《仪礼经传通解》十四册已收领讫,所言哲中善本可得借钞否?并望留神,余不一一。”^{[1](P164)}而即便就在吕、黄二人有隙之初,两人关于藏书的交流仍未停止,康熙八年吕留良《寄黄太冲书》“近得《程北山集》六本,为宋纸印者。又钞得《诚斋集》一本,则旧本所未见。又《吕泾野集》二十本,《蔡蛟滨语录》四本及余明人集数种,俱待晤时呈览也。《赵浚谷》《霍渭崖》二集,并望借看。外书目一纸奉记,以备简发时遗忘。”这些记载也正与黄宗羲的藏书特点互为照应,黄宗羲作为清初浙东私人藏书最富者,其“续钞堂”藏书多达六七万卷,且多以手钞本为主,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当时藏书交流活跃情况的侧面反映。至于当时著名的藏书家黄虞稷、周在浚等人,吕留良也有往来,康熙十二年(1673),吕留良为搜书出游,至南京见黄、周二藏书,“欣然借钞,得未曾有者几二十家,行吟坐校,遂至忘归”^{[2](P30)}。对于这一经历,吕留良还曾作诗记之,见于《零星稿》,一首《访黄俞邨留饮》“十年前识旧春坊,喜说无双江夏黄。自是梦魂时照屋,岂期醉影昼登床。帖临定武肥钩本,画辨宣和小篆章。斗室风流看未足,争教老眼不加狂。”另一首则云“莫言难借似荆州,生子谁如孙仲谋。红豆独留《千顷记》,绛云曾怪六丁收。《日钞》经学公家事,零落崇文内府愁。我亦牛腰寻几束,校雠千里置书邮。”^{[2](P401)}这种以藏书为介质的交往,一方面在彼此加强学术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的同时,丰富了吕留良的藏书,另一方面也为吕留良的刻书活动提供了大量的秘本资为校勘,甚至作为底本。上面提到的吕留良访黄、周二人之事,即缘“欲编次宋以后文字为一书……室中所藏,多所未尽,孟浪泛游,实为斯事”

此外,文人学士之间结社的良好传统也是促进吕留良藏书活动活跃的重要因素之一。早在崇祯十四年,吕留良就受孙爽约请,与王皞、陆文霁、吕宣忠等人成立了征书社,这种良好读书风气的自幼熏陶,对后来吕留良藏书爱好的养成显然是有积极的导向作用的,包括后来的钞书社对吕留良开展藏书活动同样有着直接性的启发和影响。而在没有公共图书馆的当时,可以说这种形式从整体上有效地促进了私人藏书事业的繁荣。

刻书方面,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对刻书活动有着重要影响。晚明王学极盛而敝,学者末流大都束书不观,清谈无根,导致学风堕落益甚,空谈不务世事之俗风广蔓。明末清初,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思想家在总结前朝灭亡教训过程中,对这种空疏误国的学术风气进行了批判。程朱理学渐行复兴,并逐渐成为清代官方哲学,自此形成了一大批著名的理学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自兹以后,王学遂衰息,清代犹有理学以为名高者,则皆自托于程朱之徒也。”^{[3](P10)}吕留良正是以坚定的“尊朱辟王”立场开展学术活动的。吕留良“自初读书即笃信朱子之说”,为维护 and 表彰朱学,吕留良指责王学为“阳儒阴释”的禅学,主张“今日辟邪,当先正姚江之非”^{[2](P15)}。而正如钱穆先生所言“晚村之阐朱学,其意在发挥民族精神以不屈膝仕外姓为主。实非康、雍以下清儒之仰窥朝廷圣旨,以尊朱辟王为梯荣捷径所获梦想于万一也。”^{[4](P79)}吕留良在阐明自己辟王原因时直言:“弟之痛恨阳明,正为其以为良知已致,不复求义理之归。非其所当是,是其所当非,颠倒戾妄,悍然信

[1]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3.

[2]吕留良.吕留良诗文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

[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九州出版社,2011.

心,自足陷人于禽兽非类,而不知其可悲。乃所谓不‘致知’之害,而弟所欲痛哭流涕为天下后世争之者也。”“道之不明,几五百年矣。正、嘉以来,邪说横流,生心害政,至于陆沉,此生民祸乱之原,非仅争儒林之门户也。”所谓“陷人于禽兽非类”即指满清入关,吕留良认为王学盛行乃明朝覆亡的重要根源,实际是站在天下兴亡,治乱是非的高度看待问题。此外为正本清源,吕留良在否定王学的同时,还集矢于八股取士制度及其产生的庸儒之害,这些思想对于其后来的刻书活动,尤其是所刻之书的范围选择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直接影响。

而吕家“先代传书既富,而生生之资又足”,吕留良在此基础上雇请刻工,在家中开局刻书,则为其从事刻书活动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物质条件。

2.藏书情况。除先祖遗籍传承外,吕氏藏书可知的来源主要有两种途径:其一是购自山阴祁氏澹生堂藏书。由于祁承燠子孙晚年佞佛,视藏书为土苴,因而导致澹生堂藏书逐渐大量散失,其主要流归去处之一即为石门吕留良的讲习堂。康熙五年(1666)绍兴祁氏澹生堂藏书求售,吕留良即委托黄宗羲前往代购,二人也正自此事始有龃龉。据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所载:“丙午,余与书贾入山翻阅三昼夜。余载十捆而出,经学近百种,稗官百十册,而宋元文集已无存者。途中又为书贾窃去卫湿湿《礼记集说》《东都事略》。”^{[1](P118)}私淑于黄宗羲的全祖望亦认为此事乃留良授意书贾所为,以致二人始有芥蒂。而陆珑其于《三鱼堂日记》中则有记言:“晋州陈祖法言,梨洲居乡甚不满于众口,尝为东庄买旧书于绍兴,多以善本自与。”沈冰壶《黄梨洲小传》所载亦是:“石门吕留良与先生素善,延课其子,既而以事隙。相传晚村以金托先生买祁氏藏书,先生择其奇秘难得者自买,而以其余致晚村,晚村怒。”^{[2](P452)}可见传闻无定,但吕留良此次购得澹生堂藏书一事当无疑议。在得到这些藏书后,为了表达对祁氏藏书零落散失,未能传世的遗憾与惋惜,是年,吕留良作有《得山阴祁氏澹生堂藏书三千余本示大火》一诗:“阿翁铭识墨犹新,大担论勋换直银。说与痴儿休笑倒,难寻几世好书人。宣绫包角藏经笈,不抵当时装订钱。岂是父书渠不惜,只缘参透达摩禅。”

而其藏书来源的另外一种途径则为抄录馈赠。抄录乃我国古代私人藏书家藏书的重要来源之一,吕留良亦是在这一方面不遗余力,其在所作《客坐私告》一文中明确自己三畏、九不能的同时仍然表达了对抄书这一形式的认可,“但欲依钞书社例,各钞所有之书相易,则可”。吕氏深喜宋人之书,广泛搜罗前人文集,为网罗逸逸,常常到处访求,或与人交流互抄。前已提到康熙十二年(1673),吕留良前往金陵访黄氏千顷斋、周氏遥连堂之事,历时近一年,抄得各类罕觏秘籍数千页。康熙十七年(1678),吕留良访书至嘉兴,于沈受祺处受得钱吉士文稿及沈氏己文。在吕留良同他人来往书札中,也常见其与友人相商访书借书之事,如在康熙十五年(1676)寄与董杲的书信中即托其“凡明文,不论房行社稿,皆为我留神访之。又汤若望有《天文实用》一书,幸为多方购求一部”。

苦心经营之下,吕留良遂成为明清之际两浙颇具影响的著名藏书家,而在其藏书中亦不乏各种宋元善本秘籍,除见于留良与友人往来书信的介绍中外,相关题跋资料亦常能于各处散见。如黄丕烈《士礼居藏书记》:“《小畜集》三十卷,补钞宋本……其缺者皆吾研斋钞补,不知谁何也。……宋刻本有‘野竹家’、‘吴郡沈文’、‘沈辨之’各印,钞补本有‘惠我’、‘小红豆’两方印,……其余‘耻斋’、‘光轮’等印,皆不可考矣。俟与吾研斋名续访之。”^{[3](P223)}黄丕烈起初未明卷中所钤“耻斋”“光轮”等印实为吕晚村名号之印记,“吾研斋”乃吕氏藏书楼,据此当信此书原为留良所藏。再例,见马思赞题元王蒙《秋壑鸣泉图》上跋语:“余曾见宋石门画本于

[1]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2005.

[2]李慈铭.越缙堂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3]黄丕烈.士礼居藏书记.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语溪……今年客武林，过张容轩寓舍，忽见此卷，盖即石门家藏。”并就此专门有诗赞及“东庄如此风流在，君辈还须慎护持。”^[1]

3.刻书倾向。吕留良在家中所开书局，以“天盖楼”署名，兼理刻印及发行书籍事务。作为吕氏家塾刻本，天盖楼所刻书籍不仅在刻书质量上沿承了家刻本底本好、校勘精、刻工良、纸墨佳的传统，且在书籍类型上呈现了明显的倾向性特征，即以选评时文与程朱理学著作为主。

其一，倾向于刊布时文选评类书籍。之所以矻矻经营于时文选评，吕留良认为“非时文不足明道”。他认为辨明事理要从语言文字着手，因为语言文字乃“心之声”，文字之坏源自人心之坏，反之文字之善，亦足以救正人心隐微深锢之疾，从改善文字进而改善人心。故而欲借此做救正世道人心之努力。同时，吕留良认为“道之不明也久矣。今欲使斯道复明，舍目前几个识字秀才，无可与言者。而舍四子书之外，亦无可讲之学。”其目的正是要通过时文选评来传播自己思想，即所谓“偶于时艺，寄发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痒中自出之声”。此间就包括自己的“世所讳忌”的政治主张，即“华夏之防大于君臣之义”。而这种反清思想在当时清廷统治下进行传播，就必须采用一种异乎寻常的方法，吕留良恰是借助科举制度下时文的独特属性，因而不惜以大量精力从事当时被认为是“纸尾之学”的时文选评，前后评选结集二十余种，尤以大量明末抗清志士作品为多。以其所选评并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十一月刻成的《江西五家稿》为例，“五家”分指艾南英、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及杨以任。五人中艾、章、罗、陈四人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主文章之柄者四十余年，海内称为四先生”，杨以任的制艺文章则“海内传诵，与陈、艾、章、罗齐名”。吕留良则认为他们的制艺文章“倡正说于天启之间，论题则复稟传注，体法则准诸先民”，以“五人文品相近”^[2]，故将五家八股制艺分别点评，刊刻行世。而直至临终前三日，吕留良仍在为达成其夙愿辑成三百年制艺文《知言集》一书，手批目览，仔细改订，命子公忠执笔，“一字未安，辄伫思商酌”。陈祖法在晚村祭文中叹到“其大者在扶正道于将坠，阐微言之未绝，特于制艺中晰毫厘而抉精髓”。

其二，倾向于刊布程朱理学著作。由于“尊朱辟王”的思想立场，为提倡朱子之学，扭转学术风气，吕留良对于程朱理学的说经之作专意颇深，因此天盖楼刻印了大量的相关书籍。康熙八年（1669）张履祥馆于语水，劝留良“刻《二程遗书》《朱子遗书》《语类》及诸先儒书数十种”^{[3]P167}，在张履祥建议下，吕留良先后刊刻了《二程全书》6种6卷，《朱子遗书》初刻7种71卷，《二刻》32卷，吕、张二人后来又合作选编《朱子语类》一书，未付梓而二公先后谢世，终由留良长子公忠合两家之所采，汇而录之，刻成《四书朱子语类摘抄》38卷刊行于世。

吕氏天盖楼刻书的倾向性表现出了受其所有者思想立场与学术活动的明显导向特征。可见，某一时代的政治与学术文化发展情况是能够从该具体时代的刻书特征中得到一定反映，且并不仅仅局限于外部形态特征的。

二、吕氏著述行为与藏、刻书活动间的良性互动

吕氏天盖楼刻书嘉惠来学甚多，以致后来“天盖楼之言盈天下，天下以为家有其书”（张符骧《与吕无党书》《依归草》卷十七），而这也与其藏弃丰富所提供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至总体而言，二者则皆与吕留良

[1]马思赞：《道古楼诗选》（卷下），清道光七年刻本。

[2]吕葆中：《刻江西五家稿记言》，吕晚村评点江西五家稿（卷首），康熙二十一年刻本。

[3]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3。

本人的著述行为表现为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

首先,丰富的藏书为其著述及刻书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吕留良家中收藏宋元人文集与前人时文遗稿颇富,在此基础上他积极从事点评、编纂等方面的活动,而后将这些成果付诸剞劂,先后刻成经其选评的多种文集与前人制艺。如《池北偶谈》卷十六《谈艺六》:“石门吴孟举刻《宋诗钞》,亦至百数十家,多秘本。盖与其县人吕庄生两家所藏本。”而在搜求书籍的过程中,吕留良往往对所见经典书籍阙失改笔严重的现象感到不满,对这类书籍的勘误补残,继而更好地传先哲精蕴,启后学困蒙,亦成为了吕氏刻书的重要动力。顺治九年(1652),留良购得《朱子语类》一书,却发现该书“自三十一卷至六十六卷俱缺,而自此本至末凡十本又重出。全书又多为庸妄人所批,侮圣人之言,小人而无忌惮至此”,以致“每展阅时,恨怒无已”,而这也为吕留良后来长期致力于朱子理学书籍的纂刻埋下了伏笔。在这种“藏书——著述(撰辑)——刻书”的一套环节中,吕氏所藏之书为其提供直接素材与动力的基础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其著述、刻书的需求反过来也有效地促进了其藏书事业的活跃。在吕留良一生所从事的著述、藏书、刻书活动中,这一作用表现得尤为明显。凡遇著述、刻书所需,吕留良或跋涉千里,登门移录,或辗转请托,采访置购。康熙十二年(1673),吕留良“欲编次宋以后文字为一书”,因“室中所藏,多所未尽”,至金陵借钞见黄俞邨、周雪客藏书数十种。自康熙十四年(1675)起,留良便开始搜集前人制艺,欲辑三百年制艺文编刻一部《知言集》,十五年(1676)年,吕氏嘱其子公忠代访“宋人文集及《知言集》稿子,不可忘。若见常熟陆湘零名灿者,索其旧稿。无锡华氏有《虑得集》,便则求之。问顾修远家尚有书可访否。有十二科程墨硃卷未见者,亦要寻。”^{[1](P36)}康熙十七年(1678)春,留良为搜求《知言集》文稿访书至嘉兴,拜访沈受祺,沈氏尽出残帙,并钱吉士所选《同文录》一部相赠。类类事例,不一而足。

由是观之,在学术性目的支配下的藏书家刻书活动中,其著述行为与藏、刻书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往往是能够表现得越为直接明显的。

三、结语

吕留良作为清初文字狱案的重要牵涉者,盖因其作为明末遗民,在宣传反清思想方面则采取了一种异乎寻常之法,即通过评选时文来宣传自身政治主张。吕留良通过在时文中对腐儒的批判将矛头指向他们所信奉的王阳明的“心学”,倡导对程朱孔孟思想的尊崇,借之明夷夏之防,辨出处之节。因而在这些时文评语中,民族思想表现得尤为浓厚。随着吕留良所评选的时文发行益广,以至“文章举子家多以伊所论之文为程法,所说之义为定义”^{[1](P360)},其宣传的思想为后来的曾静所本,写入《知新录》,直接导致了吕氏受曾静案牵连受极刑于身后,被剖棺戮尸,并由此导演出了一桩震惊全国的文字大狱。而他的这种著述倾向,也可在其藏刻书活动找到线索和印证。因之,对吕留良藏刻书情况的考察是不应当被忽视的,吕留良作为清初抱有遗民思想的文人代表,这种考察不仅对于吕留良本人相关研究的开展有所助益,而且对于整个清初遗民社会问题的研究都是有着一定借鉴意义的。

(责编 樊誉)

[1]吕留良.吕留良诗文集(下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